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建构

陈甜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桂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其历史演进分为改革重建期、规范转型期、跨越发展期、创新导向期四个阶段，并遵循三条演变逻辑理路，一是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二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三是探索语言教学规律。为构建我国新时代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导向，并积极探索多语种政策规划与建设。此外，还要加强外语教材政策执行评估，进而推进政策话语体系科学性和可推广性。

**【关键词】** 改革开放；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

**【基金项目】** 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YCSW2023160）“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24年11月7日

**【出刊日期】** 2024年12月26日

**【DOI】** 10.12208/j.ije.20240077

###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in basic educat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ian Che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deepening, and a unique discourse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asic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forme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reform and reconstruction period, normative transformation period,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innovation-oriented period, and follows three logical evolution paths. Second, it embodies the will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third is to explore the law of language teaching.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bas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of China,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multi-language polic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evalu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so a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ity and extensibility of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ic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Policy discourse system

外语教育政策隶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是语言政策与教育政策的交集。作为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外语教材政策则是指为实现教育目标对外语教材的编撰、审查、出版、发行和选用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规范准则（刘瑞娜，李太平，2019）。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是反映我国外语教材政策实践过程中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是我国课程教材改革不断深入和教材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有助于挖掘其演变的逻辑理路，进而提出新时代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历史演进

不管是任何学科和领域，还是落实到具体的文本，

话语体系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内皆有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吴汉全, 201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基础教育的外语教材政策进行了多次的变革和调整。每一次变革和调整,都是根据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需求,对教材的编写、中小学的课程和教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解决。整体来看,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建设经历了改革重建期、转型规范期、跨越发展期、创新导向期四个阶段。

### 1.1 外语教材政策话语改革重建期(1977-1984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我国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放在了阶级斗争上,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当时所编教材多以政治话语为中心,其内容编写紧密结合政治运动或时事形势,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急需大批外语人才。自此,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从“政治中心”转移为“经济中心”,基础教育外语教材制度和教材内容编写开始进行改革重建。

(1) 实行“国定制”“一纲一本”,重建基础教育外语教材制度

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外语教育几近停滞荒废的情况,我国注重顶层设计,实行“一纲一本”的教材政策,规划引领教材统编工作,重建教材编审、出版发行制度,形成了“国定制”教材管理体系。1977年,我国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同年召开了全国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明确了教材管理体系由国家主导与统一要求,统编教科书由国家统一发行、统一定价。次年,《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俄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颁布,遵循该大纲的指导,完成了基础教育英语和俄语课本的编写,为稳定和恢复当时的外语教育秩序奠定了基础。此外,1979年《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对外语教材编写和审核进行了详细部署。为确保教材的出版发行和及时供应,1982年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了教材办公室。

这一时期,我国外语教育的差异性开始受到关注,开始进行分类编写和使用通用教材。《关于加强中学外语教育的意见》指出要根据具体情况,区分不同要求,注重实效,有计划地把外语教学的水平提升上去,并对优秀教材和相关读物进行奖励。具体而言,第一,外语教学关注到了不同学段和学校的差异,在对1982年《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设计时考虑到了不同学段,并针对师资条件不同的学校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这一时期基础教育出现了两种学制的教材:十年制和十二年

制。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十年制英语教材出现内容上偏难等问题,于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修订了初级中学课本(《英语》6册)。第二,外语教学关注到了城乡教育的差异,1984年分别制定了针对两类地区的不同教学计划,并编写了相应教材。

(2) 聚焦“现代化”“双基”目标,加强中学外语教育指导工作

此阶段基础外语教材政策在教材选材上重点解决传统内容与先进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体现“现代化”(王攀峰,邓文卓,2022);教材内容层面重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即“双基”的培养,并注重加强中学外语教育指导。为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1978年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议总结并讨论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外语人才的办法和措施。《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1978年)以及《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1年)中也均明确指出要加强“双基”的训练。由此可见,“现代化”和“双基”是这一时期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的重要话语。

以上相关政策对教材制度、教材目标、教材内容上的规定和导向,加强了对我国中学外语教育的指导。此外,相关政策还对中学外语语种布局和教材资源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978年《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指出必须要加强中小学教育,并对外语课语种布局进行了规划,指出英语教育是当下的主要任务,同时因为国际形势需要,俄语的人才培养也要保持必要的比例,还要注意外语学习的连续性和语种衔接工作。与此同时该意见还指出每套教材应配置相应的视听教材,可以选用国外教材,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中小学外语教材资源。

### 1.2 外语教材政策话语转型规范期(1985-1991年)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原有教育体制弊端突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迫在眉睫。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明确了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此后,我国决定大力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次年四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推动了我国教材管理体制全面改革,加强了宏观管理,并实行简政放权,进一步推进了我国基础外语教材的多样化发展。

(1) 试行“审定制”“一纲多本”,着力构建新阶段教材管理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国定制”,国家垄断了

教材的出版发行权限。随着中小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基础教育教材出现品种单一、价格持续上升、质量下降等弊端。为了解决这一弊端,推进教材多样化发展,教材的编审制度进行了改革,开始实行编审分开的“审定制”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的颁布,在法律上明确教材管理制度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王攀峰,2021)。同年,为进一步监督教材的审定和审查,设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并成立了各学科教材审查委员会。而《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1988年版)和《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查和选用的规定》(1995年版)的颁布,明确了教材编审的主体人员、组织机构、程序要求,编写、审查和选用应贯彻的基本方针,实现了编审分离。199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章程》则进一步规范了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工作。

此阶段,我国外语教材的体系建设逐渐完善,教材分类分层编写,开启了“一纲多本”的探索之路。第一,编制适合不同学制学校使用的教学大纲。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试行)》,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教学大纲(初审稿),供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材编写使用,该大纲适用于当时存在的四个学制,即“六·三”制、过渡学制、“五·四”制以及“九年一贯制”。第二,设置高中起始的教材并重新推行高中选修制。1986年《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学外语教学的几点意见》,指出要在初中和高中教学大纲中设置不同的分级要求,设置高中起始的教材。1990年《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规定,选修课的设立对教材编写提出了新要求。尽管这一阶段对教材的多样化进行了探索,但本质上仍然是“一纲一本”占主导地位。(石鸥,张学鹏,2018)。

(2) 聚焦“适应性”“交际能力”,外语教材编写更为科学开放

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教学大纲,这一时期的教学大纲更加符合、适应我国国情和学校师生教学的实际情况。面对过去教学大纲缺乏课程理论指导的情况,1988年教学大纲的编制和实施经过了文献研究和实验调查分析,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其研制更为科学开放,所编的教材也就更加适应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第一,在课程内容上更加适应我国外语实际教学情况,1988年的英语教学大纲对语音、词汇和语法都分别规定了知识范围和项目,且根据泛用性、典型性和是否符合教学过程的内在要求及编者的经验精选了英语词汇,并对词汇及语法的要求作了“掌握”和“理解”的区分

(易斌,2010)。第二,在教育理论上学习了20世纪中期结构主义语言教学论,重视英语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重视模仿和记忆,教材图文并重,有利于开展直观性学习。第三,在对语言教学的认识上,受到国外教育思想影响,这一时期外语教学大纲强调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其中1985年到1991年期间颁布的三个英语教学大纲,均提出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1988年英语教学大纲改变了传统的以语言结构为大纲的形式,把语言功能放在了首要的地位,进而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适应性”和“交际能力”成为这一时期的基础外语教材政策的重要话语。

### 1.3 外语教材政策话语跨越发展期(1992-2013年)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了新阶段。为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转变当时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基础教育要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一阶段强调课改导向,着力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实现了从关注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生发展的历史性转变,具有鲜明的跨越发展特征,对外语基础教育教材产生了深远影响。

(1) 推进“审定制”“一标多本”建设,着力确保教育公平和编审质量

随着课程改革的步伐日益加快,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三级管理、两级审定的教材政策,一部分课程开发与权力逐步下放,地方和学校有了更多参与课程开发与管理的机会。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模式,《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试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教材审查,并开始实行出版发行公开竞标政策。同年,《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倡导教材编写主体的多元化、教材基本属性的特色化,对中小学教材的审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这一时期对教材的选用提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促进了我国外语基础教育教材的多样化发展。总之这一时期,教材多样化政策是根据学校、社会和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多样化。(刘瑞娜,李太平,2019)。

进入新世纪后,中小学外语教材政策由“一纲多本”转变为“一标多本”。外语课程标准的颁布,极大地推进了中小学教材资源建设,提高了外语基础教育教材的编审质量,促进了我国教育公平。第一,在课程标准的指引下,全国各地教材的编写者和出版社遵循课标中所提及的思想性、科学性、趣味性、灵活性等原则,

编写或修订了大量中小学外语教材。第二,课程标准整体设计基础教育外语课程,有利于大中小学英语教育“一条龙”衔接。第三,外语教材系列化,不少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不仅包括了必修和选修,而且还有许多辅助教材。

(2) 聚焦“学生为本”“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扎实推进全体学生素质教育

这一时期,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关注学生的发展,以“双基”为前提,聚焦“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整合,进而培养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对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20世纪初的课程改革宗旨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2001年教育部制定颁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外语课程标准,其中,新的英语课程标准指出,英语课程要面向全体学生,并注重素质教育。这些课程标准倡导从三维目标来具体设计课程,指导基础教育外语教材的制定,试图改变过去课程内容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

为扎实推进全体学生素质教育,我国外语基础教育教材政策还关注到了具体学段的发展和衔接。第一,衔接初高中英语教学,确保其连续性和完整性。为了与《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衔接,国家教委经过调查、研究和讨论,制定通过了《全日制高级中学大纲》(初审稿),并于1993年秋季在全国部分学校进行实验。第二,着手恢复和发展小学外语教育,进一步普及义务教育。早在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规定,小学三年级可以开始学习外语课程,并制定和编写了英语教学大纲和教材。1992年规定条件允许的小学可增设外语,可在高年级开设外语,自此开设外语的小学数量迅速增加。次年《小学英语教学与教材编写纲要》颁布,明确指出小学英语教材编写和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 1.4 外语教材政策话语创新导向期(2014-至今)

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我国积极投身于核心素养的研究,并于2016年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框架,2017年推出了普通高中各学科核心素养体系和标准,2022年颁布了以核心素养的导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这一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总体目标,高度

重视教材建设,不断强化教材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推动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1) 优化“审定制”“一标多本”建设,持续完善教材治理体制机制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的顶层设计,我国课程教材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第一,健全原有“审定制”,全面落实教材建设的主体责任。2019年明确对教材实行“五审盲审”制度,教材质量得到了保障。此外,国家教材小组更名为教育部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并正式设立国家教材委员会和教育部教材局,进行教材领导决策、宏观掌控和具体教材政策制定。第二,系统规划了教材建设未来发展的长效机制,外语教材建设呈现“一体化”和“数字化”发展趋势。其中“一体化”要求现有大中小外语教材要能够进行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王铭玉,袁鑫,2023)。“数字化”要求将数字技术与教材相结合,推进教材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扩大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第三,进一步规范教材选用,严守意识形态,实施教材建设国家奖励制度。组织开展大中小学教材教辅意识形态专项排查,明文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可引入境外教材,普通高中要按国家要求选用教材。此外为推广优秀教材,召开了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

随着教育的不断深入,2017年、2020年、2022年教育部相继颁布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原有教材已不能满足新课标要求,随即开始了新一轮中小学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如今,新编外语教材正在陆续投入使用。

(2) 聚焦“国家事权”“学科核心素养”,强化基础外语教材育人导向

习近平主席曾明确表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这一阶段“国家事权”不仅体现在对教材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还体现在对教材内容的建设,落实国家事权,是教材建设的准则。第一,基础教育外语教材编写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反映时代需求。这一时期的课程标准均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目标,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第二,基础教育外语教材编写着眼于本土化,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时代新需求,中华文化、劳动教育等重大主题在外语教材中的比例逐渐增多。《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政策的颁布,促使中小学外语教材有机融入中国红色故事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核心素养强调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

外语学科核心素养兼顾外语学科特色和通用能力培养,是学生接触其他文化、形成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我国,英语为主要外语语种之一,发展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该阶段中小学英语教育的主要目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围绕这一目标,我国基础教育英语教材编写更加体现科学性,尊重语言学科的知识逻辑。

##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演变的逻辑理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演变贯穿着三条逻辑理路:一是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二是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三是探索语言教学规律。

### 2.1 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不断调整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

外语教育政策容易受到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张治国,2018),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始终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重建期,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以恢复和建立正常教育教学秩序为重,教材编写内容选择强调“现代化”,反映“先进科学文化”,进而培养“双基”。转型规范期,明确了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系,教育改革以实施义务教育为重心,教材编写内容强调“适用性”,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着力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跨越发展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素质教育成为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教材编写内容强调“学生为本”,发展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创新导向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成为时代之需,教材编写内容强调“国家事权”,重在培养学生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从改革重建到创新导向期,我国外语基础教育教材政策话语呈现出从主要关注政治、经济到关注知识传授,再到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可见,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在不同时代教材话语体系发展中起到了价值引导的作用。

### 2.2 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探索政策话语统一与多样平衡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贯彻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一条主线,外语基础教育教材政策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话语权从国家垄断逐渐转为国家主导、多元主体。改革重建期,正确处理了思想道德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强调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劳动者,中小学教材

实行“国定制”,统编教材由国家统一发行、定价和出版,教材出版发行权被国家完全垄断。转型规范期,为扭转轻视教育、知识和人才的极端错误思想,使得教育更好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国家开始实行“审定制”,教材的编审制度进行了编审分离的改革。跨越发展期,面对90年代应试教育倾向,我国开始倡导实行素质教育并重新制定教学计划、大纲和课标。为促进教材多样化发展,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并实行三级教材管理制度(中央、地方与学校)和两级教材审定(国家、省)的“审定制”。创新导向期,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并搭建了教材评价反馈平台,党和国家进一步加强对教材建设的宏观管理。意识形态较强的三科教材采用“国定制”,其他学科则继续采用“审定制”。可见,我国教材管理制度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凸显国家意志,逐步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教材政策话语平衡的路径。

### 2.3 探索语言教学规律,发展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外语育人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致力于探索中国本土化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创新发展基础教育外语育人路径。我国教学计划、教材大纲和课程标准所蕴含的理论基础和学科认识受到了国外理论研究成果影响,并最终影响外语教材政策的内容制定和落实执行情况。以英语为例,改革重建期,我国教材大纲和教学参考书都没有明确的教学理论指导,但所引进的外国英语教材几乎都是结构主义语言教学理论为基础编写的,对我国中小学外语教材编写影响较大,因此本阶段英语教材主要以语法结构体系来设计总体框架。转型规范期,面对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能力较差的调查结果,我国借鉴了欧洲共同体国家语言学 and 语言教学研究的成果,引进了交际语言教学的思想,为英语教材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从此以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编写的教材占据了该时期的主导地位(易斌,2010)。跨越发展期,“知识本位”“学科本位”和原有基础教育所存在的弊端不断暴露,世纪之交掀起的全球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运动为我国改革提供了参考经验,推行以“学生为本”的素质教育势在必行。这一时期英语课程标准侧重强调语言的功能,体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高度统一的语言观和在语言实践活动中建构知识和发展能力的语言学习观。创新导向期,为应对时代变化与未来发展,各国纷纷制定21世纪核心素养,“素养”逐步替代“素质”,着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积极探索语言教学规律、学习国外教学理论,并试

图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

### 3 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为构建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依据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本文得出以下三点构建路径。

#### 3.1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打造中国特色教材政策话语体系

纵观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发展与演变历史,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改革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经验,也是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障。正是有了党对教育领导工作的不断加强,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由此,新时代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一,要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始终坚持党对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第二,要注意政策本土化。必须坚持教材政策扎根中国大地,坚持为人民服务。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应融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从我国外语基础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和基础教育管理问题出发,加强政策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整体规划不同学科学段内容,进而建设科学完整教材政策话语体系。

#### 3.2 坚持立德树人导向,探索当下多语种学科发展与建设

党的十八大确立了“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语种规划作为外语教材政策的一部分,应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导向。然而我国外语语种规划内部失衡,外语教育在不同语种、同一语种各培养层次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没有发挥区域的地缘优势(束定芳,2013)。基础教育的外语语种规划多见于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等,改革开放以来,英语一直都是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倡导的主要语种,在此之前以俄语学习为主。随着国际关系变化和全球化进程加快,日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四门语言也逐渐纳入外语规划语种,多语种教育在一些以外语为办学特色的学校发展势头良好。然而,尽管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早已被列为高考语种,直至2014年才启动相关中学课程标准的研制,可见当下仍需积极探索多语种学科规划与建设,并发挥好区域的地缘优势。

#### 3.3 加强政策执行评估,加强教材政策话语体系可推广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当今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挑战与机遇并存,构建中国特色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体系是时代之需,但我国教材政策话语的有效性和可推广性仍需要继续加强(王攀峰,邓文卓,2023)。为推进基础教育外语教材政策话语的科学性和有效执行,首先,政策制定时,应调查清楚具体情况并征求政策执行者的理解和意见,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其次,政策执行过程中,需通过会议、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加强教材政策宣传工作,并在必要时给予一定的支持,如人力和物资等。最后,还需要注意政策执行过程中,来自执行者的执行反馈,并及时进行沟通、协商和调整。

### 参考文献

- [1] 刘瑞娜,李太平.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中小学教材政策的演变特征及未来走向[J].基础教育,2019,16(01):47-54.
- [2] 束定芳.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45(03):426-435.
- [3] 王铭玉,袁鑫.新时代我国外语教材建设的使命、任务与展望[J].外语界,2023,(06):2-6.
- [4] 王攀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科书政策话语体系的回顾与反思[J].课程.教材.教法,2021,41(09):55-62.
- [5] 王攀峰,邓文卓.中国教科书话语体系构建的价值、问题与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23,43(04):42-49.
- [6] 王攀峰,邓文卓.我国学科教材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建构[J].中国教育学刊,2022,(12):45-51.
- [7] 吴汉全(2020),《话语体系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 [8] 石鸥,张学鹏.改革开放 40 年教科书建设再论 [J]. 教育学报, 2018,14(2):26-33.
- [9] 易斌.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研究(1978~2008) [D].湖南师范大学,2010.
- [10] 张治国.外语教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例[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8,3(06):66-74.

**版权声明:** ©2024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